

1104

紀念談遷誕辰四百周年文集

姜東舒題



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纪念谈迁诞辰四百周年文集

《海宁人物资料》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海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三月

封面题字：姜东舒

责任编辑：陈伯良

何岁华

校 对：张敬夫

纪念谈迁诞辰四百周年文集

准印证号：浙出书临

C943第174号

印 数：1500本

印 刷：市府电脑轻印所



谈迁画像

(1594—1658)

目 录

一、纪念爱国史家谈迁诞辰四百周年	
——谈迁的生平和在史学上的贡献 … 仓修良	(1)
二、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	郑克晟 (21)
三、谈迁	罗仲辉 (45)
四、谈迁及其《国榷》	罗仲辉 (53)
五、谈迁《国榷》成书年考	徐 凯 (66)
六、谈迁《国榷》研究三题	钱茂伟 (69)
七、爱国的历史家谈迁	吴 晗 (75)
八、谈迁和国榷	吴 晗 (81)
九、吴晗和谈迁	臧 嵘 (100)
十、谈迁故居考	许逸云 (106)
十一、谈迁年谱	陈伯良 (109)
十二、后记	(154)

纪念爱国史家谈迁诞辰四百周年

——谈迁的生平和在史学上的贡献

仓 修 良

今年是明末清初爱国史家谈迁诞生四百周年，他的故里海宁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此集会，纪念先贤，以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弘扬谈迁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和艰苦卓绝的治学精神，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并自署“江左遗民”。盐官（今浙江海宁）地方人，他在《枣林杂俎》中说：“吾上世以宋靖康（公元1126年）之难，自汴徙于杭者四传。德祐末（1275年），避兵徙盐官之枣林。”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卒于清顺治十四年（1658年），享年六十四岁。关于他的生卒年，史书无明确记载，大多根据他自己所作《北游录·纪文·六十自寿序》推算，因而常有一岁之差。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其一生则是在穷困潦倒的环境中

度过，直到晚年，仍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其父、祖皆为儒生。父于庭是位老秀才，终身未仕。故谈迁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生活困窘。然而他贫而有志，平生于世味无所嗜好，只爱读书，尤爱治史，特别是有明一代史事，更是专心搜集。贫困的生活，造就了他那耿介廉直的性格，培养了他那高风亮节的品德，正如《海宁县志·隐逸传》所称颂的那样：“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他的书斋曰“容膝轩”，可见这个书斋很小。《北游录·纪卹》里就记载了他多次拒绝了别人赠送的礼物，更拒绝拿钱买他的文章，甚至1656年从北京返回时，也不肯请人家写封信予以方便。《北游录·后纪程》后记曰：“余北游倦矣，得返为幸。……在燕时，或修贄广谒，略可自润，而余不能也。别居停竟长揖出门，不更求他腴。道中蹶一敝屣，殆于决踵。余岂不忧日后耶，忧日后又不如忍目前。余归计决矣。拒簪而往，亦担簪而回。篋中录本，殆千百纸，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这段文字充分体现出他贫而有志的坚强性格，除书籍资料外，既不请托任何人的帮助，更不求取任何人的馈赠，宁可艰难地过着清贫的生活，默默地来完成自己的伟大志向。他的生平，由于史籍很少记载，这就给后人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情况，材料就更加奇缺，基本上是个空白，从他自己有些著作我们还可以发现零星的记载，可证实他早年曾经做过塾师，《枣林杂俎》和集《葦舟》条曰：“崇禎乙亥（崇禎八年，1635年）予馆海盐横山张氏。”又《北游录·纪程》开头便曰门人包令孺云云，可见他早年确实曾教书为生。

明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二十八岁，因母亲去世而居

家守孝，于是集中地阅读了陈建所作的《皇明通纪》，发现该书写得很差，不仅内容有很多错误，而且见解也很肤浅，真可谓见既不多，识又不广，自然无法写出一部有价值的明代历史。而当时所写的明代史书尽管很多（全祖望在其文集《鲒埼亭集》中就曾讲了“晚明野史，凡千余家”），而能令人满意的并不多见，关键在于真正称得上史家的人很少，因为史家要具备“三长”，而作者则大多为缙绅士大夫，想借此留名于世而已。所以黄宗羲在《谈孺木墓表》里已经指出：“余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夫作者无乘传之求，州郡鲜上计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词，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以余所见，近日之为□□事者，其人皆无与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长篇累牍，行世藏家，即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岂以后世都可欺乎？”（《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因而往往有一得之见，一隅之闻，甚至道听途说，即便着手编写史书。什么史才、史学、史识，什么史家笔法，全然不在话下，要编写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岂不难哉！实录不实，野史失真，而对这种状况，谈迁决心自己动手编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明代历史。黄宗羲在《谈孺木墓表》里说他“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为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励，而太史遁荒，皇威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这就把谈迁编写《国榷》的动因，交待得清清楚楚。

写一部史书先决条件便是要占有丰富的史料，这对谈迁来说，尤其是一大难题。因为他家境贫寒，并无多少藏书，况且要写的乃是当代历史，更需要搜集第一手材料，因而他长年累月四处奔走，向藏书之家借抄借读，常常是步行百里，其中甘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晚年他在给某些友人信中就曾吐露了某些真情，在《上太仆曹秋壑书》中说：

“迁本寒素，不支伏腊，购书则夺于饘粥，贷书则轻于韦布。又下邑褊陋，薄视细纣，问其郅架，卒资帖括。于是问一遗编，卑词仰恳或更鼎致，靳允不一，常形梦寐。即櫛李鼎阅间，亦匍匐以前矣。”（《北游录·纪文》）

又在《上吴骏公太史书》中说：

“迁自恨绳枢瓮牖，志浮于量，肠肥脑满，妄薄流览。尤其本朝，欲海盐（郑晓）、丰城（雷礼）、武进（薛应旂）之后，尝鼎血指。而家本担石，饥梨渴枣，遂市阅户录，尝重趸百里之外，苦不堪述。条积匿藏，稍次年月，砑砑成编。”（《北游录·纪文》）

我国古代，外出访书乃是常事，就如藏书近数万卷的黄宗羲，尚且每天带着书童，四处访书，晚上归来，总是肩挑一担书而回，看完送还。谈迁当时条件显然比不上黄宗羲，家境既贫，又无声望，因而借书之中往往遇上许多不顺心的事情，尽管如此，为了能看到书，还是卑词恳请，耐心等候。他在《北游录》中，还为我们留下在北京寻访故迹、登门借书遇到的不愉快的片段，在《北游录·后纪程》序中说：“盖追访旧事，稍非其人，则不敢置喙。至于贷书则余交寡，市书则余囊耻。”又在给友人李楚柔的信中，讲得更具体了：“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晨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门永昼。而借人书重于卞

氏璧，不可复得，主人邨架，颇同故纸，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北游录·纪文·寄李楚柔书》）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借书的心情与精神状态，他本来口才就不很好，年岁又大了，为了能看到所需之书，抄得所需之材料，还不得不时时去看人家的脸色，听别人的安排，耐着性子静心等待，至于碰壁之事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可见登门借书，采访旧事，寻访故迹，其中饱含着多多少少的甘苦与辛酸！

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着手编撰之事，经过五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榷》的初稿，这是他在天启六年三月所写的自序中所说。四年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喻应益在为《国榷》所写的序中，就已经盛赞《国榷》内容丰富，谈迁有良史之才。序中曰：“三代而后，……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记载或失之略。……盐官谈孺木，乃集海盐（郑晓）、武进（薛应旂）、丰城（雷礼）、太仓（王世贞）、临朐（冯琦）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尽收，勒为一编，名曰《国榷》。”接着便称颂此书“洵一代之鸿业”，而谈迁“本盖良史才”，“故成其大志”。由于崇祯一朝没有实录，故初稿仅写至天启。为了完成一代全史，初稿完成后，便继续搜集资料，不停地补充和修订。南京是明初建都之处，后又为南明王朝之都城，要写好有明一代历史，这里自然必须前去采访。所以崇祯十一年（1642年）便毅然到了南京，并在此先后结识了南京兵部尚书高弘图、吏部尚书张慎言，二人深慕谈迁“为奇士、颇折节下之”（《谈孺木墓表》）。谈迁后来在写《六十自寿序》时，对当时的情景还有片段的回忆，从此乃为布衣之交。崇祯十七年四月中旬，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是年五月，在南京便建立了南明王朝，福王由

崧为监国，继而称帝，改元弘光。高、张二人仍任要职（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仍为吏部尚书），“凡新政之得失，皆就諮于处士，多所裨益。”后谈迁入为高弘图幕室书记，更为高、张出谋赞画，力图恢复，还曾为兵部尚书史可法起草誓师檄文。但谈迁眼看南明王朝之昏暗腐败，振兴明王朝幻想破灭，乃力辞高弘图之推荐，不愿出任中书舍人及参与修史，不仅如此，还力劝高、张二人应辞官引退，以避免“将任误国之咎”。可见他们之间往来之密切。在南京期间，他有机会查阅南都内阁藏书，看到了以前尚未见到的有关实录和崇祯邸报，搜集到大量遗闻佚事，并将数年读书所得，编为《枣林杂俎》一书，高弘图于崇祯十七年九月为该书所作序中云：“谈子孺木有书癖，其在记室，见载籍相饷，辄色然喜。或书至猥诞，亦过目始释，故多所采摭。时于坐聆途听，稍可涉笔者，无一轻置也。铄而积，寸而累，故称杂焉。”可见他是何等喜爱读书，而阅读之中，凡有心得，必作笔记。对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凡是有意义的亦必记录。他在始吴伟业信中曾讲了，他“性好涉猎，过目易忘”，因而使用笔记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至于这本书为什么要叫《枣林杂俎》？特别是“系以枣林何也？”他在该书《题词》中深有感情地说：“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难，自汴徙于杭者四传。德祐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今未四百祀，又并于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无从，庶以枣林老耳，书从地，不忘本也。”这就是说，他对于生他养他的这块地方，终身不会忘记，故用它来命名自己的著作，这是多么意味深长！这是一部“杂记有明一代典制掌故，下及小说遗闻，足补史事之缺。”全书分智、仁、圣、义、中、和六大部分，十八子目，一千三百余条，民国时期上海进步书局曾有石印本六册。如《逸典》中

之《金陵对泣录》、《定策本末》、《史相国督师》等，都是重要史料。又如《食盐》条，则揭露了当时的苛政，“官吏食盐，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纳钞一贯，乡民每人二斤二两五钱。每斤纳米五升三合二勺二秒五撮。景泰中，官纳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官定十五口，吏七口为率，又永乐二年，大口钞十二贯，小口六贯，盖以盐给民，故征钞，今官不给盐，而钞征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赋正苗一斛，别输三斗，授盐二斤，曰盐米，元宗交泰初，淮甸盐场入于周，遂不支盐，而输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论，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复问也？”再如《富春谣》更反映了富阳人民的哭诉：“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按察金事朝邑韩邦奇疏载之，削籍。”韩邦奇是正德、嘉靖年间一员清官，在任浙江金事期间，有中官王堂等在浙江任镇守，四出扰民，他因屡加裁抑并作歌哀民，被逮下狱，斥为民。谈迁是从其奏章中抄得此民谣，这就看出谈迁所看之书是十分广泛的，而摘录之内容又大多关系着国计民生之事，再如《江南民运》、《南京贡船》乃是记载苏、松、常、湖、嘉等地运粮数字、船只数字、贡品种类及数字等。可惜此书解放后尚未整理出版。

谈迁在崇祯六年（1626年）完成《国榷》初稿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不断补充和修改，至顺治二年（1645年）续成崇祯、弘光两朝事，其间“六易其稿”，成百卷之书。他在《跋》中说：“此丙寅旧稿，嗣更增定，触事凄咽，续以崇祯、弘光两朝，而序仍之。”表达了他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在撰写此书，可

以说一部《国榷》，和泪而成，充分反映了他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国家虽然亡了，但国史必须流传下去，这就是这位明末遗民的决心。也正因如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充满在该书的字里行间。令人痛心的是，两年后，即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凝聚了谈迁二十六年心血的《国榷》竟然被人盗去了，这对于年过半百的老人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黄宗羲在《谈薨木墓表》中说：“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借。闻君之有是书也，思欲窃之以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相国借书，复成之。’”书被盗窃，对他精神上打击是可想而知，但他虽已年迈体弱，却并不灰心，为了保存故国的历史，便振作精神，决心再写。他在《国榷·义例》中说：“丁亥（顺治四年）八月，盗肱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略焉。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类之矣。”他这种矢志不移的惊人的毅力和爱国的热情，永远值得人们敬重和学习。“吾手尚在，宁遂已乎！”这是多么坚定有力的声音。事情发生后，他尽快地使自己悲愤的心情平静下来，又背着干粮行李，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等地，向各处藏书家借抄借读，顾不上严寒酷暑、饥饿疲劳，历经五个寒暑，终于又完成了第二次编写的初稿。但是，要作进一步修改，工作量还很大，其中最困难的莫过于补充材料，尤其是崇祯一朝，尽管有些记载，大多得之于传闻，不仅要查找更多的有关记载，而且更需要找往年那些当事人当面核

实,这就非去北京不可。然而对于一位朝不谋夕的穷儒生来说,去北京谈何容易,因为不仅是去北京路费无法筹措,即便到了北京,吃住又如何解决,况且去的目的毕竟不是游山玩水。为了更好地完成编修一代信史的大业,多年来却一直在作“东京梦华之思”。顺治十年(1653年),这年正是谈迁花甲之年,居丧在家的义乌朱之锡,是清朝弘文院编修,服满欲进京供职,聘他做书记,从而使他获得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去北京的机会。这年闰六月,便担着简单行李和《国榷》书稿,随朱之锡从嘉兴坐船沿运河北上。在北京朱家住了两年半,除了替朱之锡办些文墨工作外,便将全部精力用于搜集史料和访问有关史事的人物,对《国榷》进行补充和修改。

在北京期间,他跑得最多的自然是那些藏书家,而去的次数最多的那就是秀水曹溶、太仓吴伟业、武功霍达。曹溶因是同乡,自然容易交往,后两人可能是通过曹溶介绍而认识的。这三个人都是崇祯进士,都是藏书家,都熟识明朝掌故,当时又都在清朝做官。从《北游录·纪邨》中可以着出,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与此三人彼此来往,讨论有关史事。他还四处访问明朝的降官、贵族子孙、官僚、太监、门客、城市和乡村有关居民,只要有点线索,他都从不放过。还亲自访问察看历史遗迹,如景泰帝和崇祯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区,香山和西山的古寺庙等等,凡是和写史有关的,那怕是断墙残碑,也要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并跟有关人员进行详细交谈,然后将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详细作了记录。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如实地叙述了谈迁访求遗闻轶事的辛劳情况:“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北京),每登跋蹶屣,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

日对一编，掌大薄蹄，手尝不辍，或复故纸背，涂鸦紫蚓，至不可辨。或涂听壁窥，轶事遗闻，残堵圯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在北京两年多的生活，使他对明代历史知识更加丰富了，特别是许多直观见闻，增加了感性认识，大大充实了《国榷》的内容。此外，他还将两年多时间所作之诗文、在北京的笔记、往返北京沿途见闻等，汇编成《北游录》一书，内容分《纪程》、《纪邮》、《纪咏》、《纪闻》、《纪文》五个方面，《纪程》和《后纪程》是去北京来回路上见闻的纪录，《纪邮》则是在北京时每日活动的日记，《纪咏》、《纪文》是这两年多时间所作之诗文，《纪闻》乃是典故之类。这部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这位可敬的老人，对于每天的日程是安排得非常紧凑的，而朝思暮想的乃是如何完成这部故国的史书。此时他曾作《梦中作》五绝一首：“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可见夜里做梦也在想着此书，头发一天天白了，神形也憔悴了。在旅途中，每到一处，他都要寻访古迹，凭吊英雄人物，搜集遗闻轶事。特别是对国家对民族有过贡献的英雄人物，如在镇江，亲临韩世忠大败金兀术的战场，并有七律一首，在扬州，去凭吊了“明督师太子太师兼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可法史公墓”，还特地记上“墓草且宿，不胜饮恨”之句，流露出老人爱国之隐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北京两年半时间，除了采访明代史事外，每当无法出门时，又在阅读前朝史书，《纪邮》上有这样一条记载：甲午（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丙午，“寅刻雪，寻止，薄暮微雨，阅《元史》竟。”其精心于史学研究，如何能不令人敬佩！他受聘朱之锡为幕友，意在去北京为修订《国榷》补充材料，当此任务完成后，便执意要离开北京。顺治十三年（1656年）搭漕船历时四个月回到家乡，回来时他

依旧是担着简单的行李，只是“筐中录本”多了“殆千百纸”，自然可称得上“满载而归”，尽管在北京调查访问时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情，但此时早已抛之九霄云外，留下的只有满腔的喜悦，因而在《后纪程》后序末了连声说：“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可见他所追求的既不是金钱，更不是虚名，而是崇高的事业。次年，应同乡好友山西平阳府推官沈仲嘉（贞亨）之邀请，北上平阳，后又打算去平阳城外数百里处拜谒友人张慎言墓，中途中风遽逝，终年六十四岁。可惜的是《国榷》一书虽已完整地流传下来，但他生前还曾计划撰写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这是在给友人李楚柔的信中所透露的：“顷者益究先朝史，凡片言只行，犁然有当于心，录之无遗。拟南还后作纪、传、表、志，三年为期，不敢辄语人，私为足下道也。”（《北游录·纪文·寄李楚柔书》）看来所有资料均已准备齐全，故只需三年时间，即可完成。他的著作，除上而已介绍三种外，尚有《枣林集》、《西游录》、《枣林外索》、《枣林艺箴》、《海昌外志》等。《海昌外志》台湾出的方志丛书已收入。这是谈迁个人所修的海宁县志，全书分《舆地志》、《食货志》、《职官志》、《建置志》、《选举志》、《人物志》、《丛谈志》、《艺文志》共八个门类，43目，前有自序和《缘起》各一篇，对保存地方文献有很大价值。另外四种均无刻本，《枣林全集》据《晚明史籍考》称“六巨册，稿本旧藏平湖金氏，存明代史料颇多，今不知流传何所矣。至其《枣林外索》，仅有抄本流传。”据张宗祥《国榷·题记》云：“《外索》一书未分卷，前有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年）自叙，似未为定稿。”可知张氏是见过此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清“师石山房抄本”六册，实际上也是一部读书笔记，内容多为历代典故和人物轶事，间有简要考证。涉及时间上自盘古，下迄

明代。前有顺治十一年(1654年)七月在北京所写自序一篇,可见此书亦为在京期间整理而成,而北京图书馆则收藏有《枣林集》和《枣林诗集》两种,全部著作中只有《枣林杂俎》、《枣林艺薈》和《海昌外志》三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著录。

修明史而名之曰《国榷》,这是有其意义的。他在《义例》第一条开宗明义便说:“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宁洁无靡,宁塞无繁,宁裁无赘,若亥豕之讹,雌黄之口,尤其慎旗,不敢恣臆于百祀之下。”这就是博采诸家故老之言说,鉴定平衡而约取之,力求正确允当,以订正列朝实录的不实,便是他著书之宗旨。

《国榷》是一部记载有明一代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原为百卷,现在的本子近人张宗祥先生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后重分的,故为一百零四卷,加上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四百二十八万字,卷首四卷,汇辑有明一朝章典制,分门别类,作综合性叙述,计有大统、天保、元洪、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正文纂辑史事,按年、月、日、编载,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终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叙述过程中,间附许多史家及自己评语,以阐述其事实,辨明其得失。行文上要求以简洁为主,但又不能流于“兔园册”或“断烂朝报”;事实上要求做到阙疑传信,力戒信口雌黄。惟其如此,《国榷》一书很早就获得了好评,黄宗羲称赞《国榷》的成书,“按实编年,不銜文采,未尝以作者自居”,“非徒为盗名之秘经而已。”(《谈孺木墓表》)而邵念鲁则在《明遗民所知传》里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